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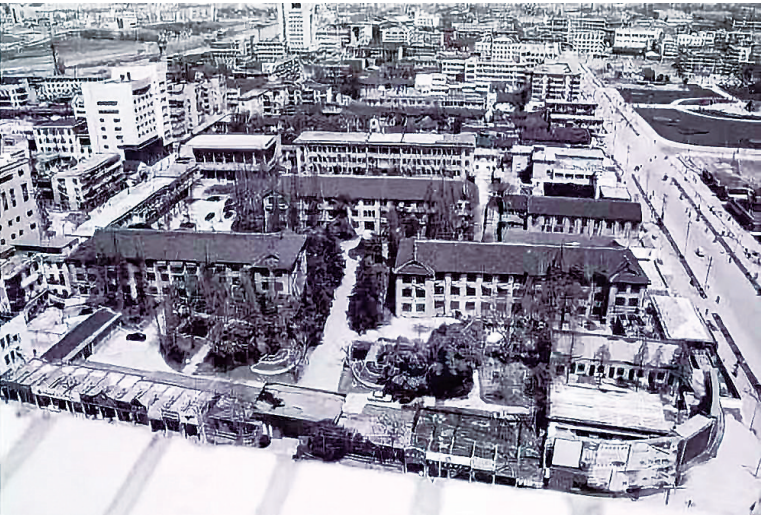
记忆中的新仓前与虹门口

洪明强

湖州红旗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由彩凤坊、黄沙路、学前滩、法院街改建而来，南街在拓宽观凤巷后，长只有1000米，与红旗路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六七十年代，三叉路北顶端，建了一个高约4米，宽约10米的大型语录牌，每逢国庆、新春佳节之际，语录牌上会写上祝贺语、或张灯结彩以示庆祝，语录牌是当年的宣传窗口，也是大型集会的舞台、游行的始发地。新仓前和虹门口，就藏隐于语录牌后，两边只留出一条小路，可通往里面的新仓前，那些年，新仓前的街名几乎让湖州人给遗忘了，住里面的居民习惯说：“我家就住在语录牌后面。”

新仓前，南起红旗路，北至榆树街，与虹门口隔街相连，长189米，宽4.5米，据史料上记载：“元代湖州泰定仓在湖城霅溪东岸右文馆处，明代迁移至乌程县桥东侧，新建的泰定仓称为新仓，故其前形成的古街巷称为新仓前。”清光绪《乌程县志》上记载：“便民仓即大仓，在安定门内西岸南仓铺。以漕输远艰，移近水次，乃改建于此。”新仓前，1970年9月改名为五星街，1981年10月恢复原名。

据《闾里记》一书中记载：在新仓前以西的学宫原址上，明朝时建有文庙、明伦堂、东西泮池，并筑有泮桥分别通往文庙、



资料照片：拆除后的新仓前、虹门口与尚未拆除的市府西大院

明伦堂，泮池周边绿树成荫，池水终年不浅，是明朝时湖州的一大胜景，文庙也是湖州唯一的孔庙遗址。

1919年5月，学宫原址上创办了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建浙师附小，抗日名将郎玉麟就读于该校，毕业后留在三师附小任教，以实现他“教书育人，建设家乡”的理想，1937年，日军占领湖州后，枪声四起，乱杀无辜，百姓民不聊生，郎玉麟一怒之下投笔从戎，参加了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成为一名让鬼子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入省立三中，旧址废弃。

1958年，嘉兴地委迁入学校的旧址，成了地委的机关大院；1983年撤销地委，设立中共湖州市委，旧址又成了市政府西大院。西大院内东边靠新仓前街口有一个高墩头，上面建有假山、凉亭，和新仓前仅一墙之隔。新仓前中段有湖州手帕厂。厂大门就在新仓前街的西边，厂区面积不大，紧挨市府机关大院，主要生产各种手帕，销往全国各地，工人不多，但手帕厂是新仓前、虹门口一带仅此一家工厂。我市已故地方文化名人寇丹先生，曾在手帕厂里工作过多年，后调入乡镇企业局，他著有《壶里乾坤》《鉴壶》《茶具入门》等专著，论文《探索陆羽》一书有中、韩文版，曾被韩国评为首批世界12位《世界茶人》之一。

新仓前东面是大片的古建筑群，也是老湖州居民的聚居地，几十年前，里面的巷子纵横交错；墙门堂、大杂院，一幢幢水质结构，青砖黑瓦的徽派楼房连成一片，四处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瓦面上，一些无名小花从瓦片的缝隙间绽放而出，青石板的地面，人走在上面发出“咚咚咚”的响声，余音会在古巷里回荡。上世纪70年代初改筑了水泥路，里面分别有直经巷、前经巷、中经巷、后经巷，还有府西街西段、高墩头等。

前经巷，又名前经堂巷，东起直经巷，西至新仓前，长70米，宽2.7米，20世纪前期被定为五等街巷，1970年9月改名为五星街一弄，1981年10月恢复原名为前经巷。

江南历史传奇中的家国情怀与个人选择

高 媛

作家海飞致力于谍战小说的写作，其作品多以中国现当代历史为背景。近年来，他将关注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社会，以明朝万历年间为故事时间，创作了“锦衣英雄”系列古代谍战小说。作为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江南役》承袭前作《风尘里》的情节内容以及人物设置，将故事背景转向秋日江南，在杭州的桥头并边开启一段轻松惬意的南方叙事，似乎淡化了记题部分篇幅描掠孩童案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但题目中的“役”字，以及伴随主人公田小七出场的宝通快火（万历皇帝所送），已经在篇首暗示出人物的这趟行程与皇权稳固以及家国安宁的重要联系。

小说全文结构较为清晰，由开场、七章正文以及尾声构成，开场部分介绍杭州城中的系列案件——七名男童相继被蝙蝠群捕走，后续七章依循凌晨到夜晚的时间发展，对应田小七在杭州城的七天生活，亦牵引出文本中另一重大谜题——钱塘火器局的军火专家赵士真被人拐走。两个主要谜题作为开篇即存在的重要线索，贯穿了小说发展始终，并在其后的发展中，一线指向皇权斗争，将前作中已经初见端倪的皇位之争及其背后的权谋诡计逐渐揭破，一线牵连倭寇阴谋，把日本中海道这一组织试图实施“破竹令”、烧毁六和塔、敲断杭州龙脉的意图和行动都暴露无遗。基于上述双重线索，小说展示了锦衣卫北门禁门掌门人田小七为主、杭州守戍军副千户薛武林为辅的人物调查过程，也写出他们身边的诸多人物的努力行动，在快节奏以及画面感十足的叙述中，完成对上至朝堂当权者、下涉民间普通人的抗御外侮行动的描写。

主人公田小七在杭州城中四处查问，无形中扮演了侦探的角色。基于对线索的整合和推论，他逮捕倭寇成员松吉，数次与倭寇直接交手，救出赵士真以及被掳掠的孩童，直至最终在杭州城内各处城门以及六和塔下跟倭寇决一死战，粉碎中海道全盘计划。人物从前作中隐居幕后的位置走向了台前，在跟倭寇这些隐形追踪的敌手进行对抗时，用个人智慧以及武技拯救了身边的朋友、百姓以及登塔参与庆典的皇帝，潜隐地为家国以及民众安宁作出了奉献，与新武侠小说中“为国为民”的侠客颇有相似之处。

人物身边的伙伴也都秉持着类似的信念，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为保护杭州城以及国家军火机密的行為平添了悲壮色彩。他们一次次付出血的代价，为的是保护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安全，他们的对敌斗争态势，就像众人在六和塔

了无

冯峻的长篇小说《阶梯》出版一年多了。我作为这部小说的第一读者和同行，真的为他高兴。这不仅为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朵五彩斑斓的山野之花，尤其是对冯峻来说，也标志着他由监狱学研究向文学创作华丽转型的成功。我之所以说是“山野之花”，是指《阶梯》的原生态生活、原生态情境和原生态呈现。因为原生态，所以，是一种清新脱俗、淳浓厚道、朴实无华，区别于常态的、给人带来非同寻常的阅读享受。

小说以一名25岁的“落魄青年”马梓筠——“这个时代年轻人中平有的还存任阶级身份意识的时代落伍者”，初入监狱担任人民警察，在“21世纪初的某日”“游魂”一般的来到“浙省的北大荒”——北关林场报到为开篇，以监狱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为基本背景，以浙江的并不发达的乡村为基本方位，全景展示了这个带有叛逆、灰色又基本品质不坏的青年人的情爱画卷。全书以马梓筠以放纵的情爱开始，以委曲求全、与现实妥协的婚姻结尾，用全息的手法，给读者诠释了“新新人类”在“开放”与“欲望”并存的年代里，与传统情爱观的极大不同；用隐喻的方式，给读者解构监狱工作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遇到的困境、挑战；用泼墨的写意，给读者呈现了并不发达的浙北底层社会生存的艰辛、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得其乐。尽管小说里的主人公马梓筠的爱情，近乎于鼠蚁之爱，但是，我读之后一直铭记在心，随时被唤醒的主题是：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每一个过来之人，都会有这样



《江南役》，海飞 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所目睹的钱塘江湖，从最初的冲天而起、雷霆万钧，发展至连天蔽日、摧枯拉朽，再到最终慢慢消散、云淡风轻，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却不曾消散。

谍战小说对主要人物家国情怀的表现，往往借助不同国族的隐秘战线对抗描写完成。本作亦延续了这种处理方式，在对抗双方人物特别是倭寇进行处理时，着意强调其“双面性”特质。这些敌对势力，恰如隐藏在黑暗环境中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的“鼯鼠”，只能借助多个化身活动在杭州城中。为了完成中海道的“破竹令”计划，创始人子丑的女儿灯盏，与丈夫携手来到中国，以多个身份游走在街巷之中，她是戏班中演出的鲤鱼，一脚将绣鞋踢在赵士真侍卫山雀的脸上，以色诱方式为绑架赵士真提供便利条件；她是相貌丑陋的杨梅，借柔弱之势吸引土拔枪枪，试图骗取《神器谱或问》母本；她是伪装的傻姑，以虚假的身份和书稿迷惑赵士真，以解药威胁对方交出《神器谱或问》母本。她与丈夫的手下石田、松吉、剃刀金等人，像水滴一样渗透进了杭州城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喜庆坊老板余船海、中山社统筹负责人以及剃头匠，在明暗兼具的双面生活中，联通了巡抚高官以及贩夫走卒，为计划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在与这些敌对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后，田小七却在结尾一切尘埃落定时，拒绝了皇上提出的“回京”要求，将锦衣卫的“忠君”信条摒弃在身后，选择留在杭州。个人感情以及皇权压力使他主动放弃以往

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的同频感受：青春是绚丽的，绚丽到不仅可以挥霍，甚至可以浪费；爱情是斑斓的，斑斓到不仅快乐，甚至可以疼痛。而《阶梯》就近乎于书写主人公马梓筠青春的浪费，爱情的疼痛。这个近乎悲剧的小说，也正是小说的看点。

《蚁鼠之爱》是冯峻长篇小说《阶梯》原来的书名。所谓蚁鼠，用小说里的话说，“他们尴尬地活于人世，活着非如己所欲，生不如死；死去又尚有留恋，苟延残喘。家庭背景尔尔，相貌气质尔尔，学历见识尔尔，做什么工作能力都是尔尔。”既然是鼠蚁之爱，自然就不是公主王子之爱，也不是公主老鼠之爱，也不可能是王子蚂蚁之爱；鼠蚁之爱，只能是蜗居的爱、屌丝的爱、草根的爱、无声无息的爱、自然自艾的爱、自生自灭的爱、勉强的爱。鼠蚁之爱，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成为稀有的、珍贵的、难得的温暖的爱、幸福的爱、快乐的爱。就《阶梯》而言，小说所要表达的所谓的鼠蚁之爱，是被急速奔涌、狂风暴雨般的现代化浪潮席卷所抛弃的被称之为的人的人，他们的身份、命运、生活等等，几乎其实与鼠蚁的情形无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爱里的酸楚、无奈以及艰辛，更多的是体现为与命运抗争的爱，传宗接代的愛，甚至为性释放而动物性的欲爱。也许我们会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与现在不太一样，那时的幸福感不是很强烈吗？问题是，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在整个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全社会呈现出较多功利、烦躁、轻狂、无厘头的景象，

个人努力捍卫，但个人生活也是日常现实的重要部分。

作品中的多个人物亦都以个人选择影响了事情的发生及其走向，展示出人物在家国情怀这个宏大主题之下的日常生活样貌：赵刻心不愿继承父亲的火器局，反而将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孤儿院作为人生寄托；吉祥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接替哥哥田小七的锦衣卫“事业”；土拔枪枪为了感情置兄弟告诫于脑后，导致兄弟为自己死去后，只能偷偷为孤儿院留下炊饼，然后孤独离去……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责任和后果。这些人物身上也体现出一种重要特质，即“替代性”。正如赵刻心替代无恙陪伴在田小七身边，吉祥替代田小七成为锦衣卫，前作中因爱入春小九为自己而死意志消沉的甘左严，也在杭州城中找到了誓要成为“新的春小九”的柳火火，并在田小七的资助下，将带有众人京城狂欢记忆的“欢乐场”开到杭州。

与上述具有延续性且指向未来生活发展方向的“替代性”特征相对应，小说还对人物选择的结果进行了一种因果循环的展示，比如赵刻心在与倭寇的对抗中，目睹大火，随即昏倒，牵扯出其童年时的一桩旧事：自己年幼好奇，用父亲的凹凸镜折射的阳光点燃了旁边的茅草顶赌坊，母亲冲进火场，想要救出最后剩下的男孩，却与对方一起被烧死。自此，火光于她而言，意味着丧母和伤害无辜者生命的罪责，但田小七却用三言两语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即是当年火场中被救的男孩，以自己的存在洗刷了姑娘内心的罪责。薛武林与昔日战友刘大壮の恩怨故事也是一种体现：早年薛武林被俘时，向阿部投降，被释放后将伤重的刘大壮带回国内，成为对方的救命恩人。但他后续所策划的蝙蝠捕掠男童案件，将刘大壮的儿子刘四宝也一并掳走，在刘四宝发现自己后，他担心罪行败露，拔刀杀死了还在拼命保护自己的孩童。恩怨纠葛在他对待父子两代人的态度中被诠释得令人唏嘘。阿部、灯盏最终逃离杭州时，乘坐的恰是水牛的父亲之船，而水牛正是在驻守弹药库时被阿部杀死的官兵，死后还被残忍割下舌头烹制。老人通过对话了解对方身份后，选择弃船入水，不管是否去意已决还是暂避风头，都留下这夫妻二人及一叶扁舟在水中飘摆。

白居易《忆江南》中“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官（苏州）”，戴表元《湖州》中“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古代诗文状写江南之景极尽美妙，海飞则在《江南役》中对江南的抗倭战事和人物情感进行展示，完成了家国情怀以及个人选择两大主题的书写。



以及中国转型里，传统社会的糟粕与西方舶来的“市场经济”“劣劣结合”对公众所造成的那些巨大的冲击以及对于冲击的条件反射所回应的“金钱崇拜”“利益崇拜”“身份崇拜”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幸福、对于快乐、对于成功等等传统的认识，都在发生某些逆转。在此情境下的人们，一切美好会被扭曲、变形和异化。这成为一唱三叹的主题，更是某种残酷的现实情形。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以写情性之爱而扬名的小说，当然首选《金瓶梅》，而爱情写巅峰的作品，当之无愧的《红楼梦》为首选。然而，在别于道学家的判断和定位，社会学家看到的是社会问题，由情、由爱、由欲、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比比皆是。《阶梯》小说的故事，这足以提振、唤醒甚至引发阅读人的阅读兴趣和期待。《阶梯》里，作者对两性场景的描写，可以说是做到了惜墨如金。冯峻试图刻画当下青年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迷失自我的同时又保持适当自律，在道德的边缘游走又守住法律底线，善于学习又自知发展提升无望而没有彻底自暴自弃的复杂的人生旅程和烦乱的人性剖析与批判。使小说主题合于主流思想，进而合于“主旋律”。

总之，《阶梯》是一部倾注作者心血，并试图证明自己的一部好小说。